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惠富平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 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 三国时期; 西部; 农业开发

中图分类号: F3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07(2002)04-0109-05

三国时期, 魏蜀吴渐成鼎立之势。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双方长期在西部关陇一带争战。过去多从政治和军事角度分析魏蜀争战的过程、谋略及结局, 本文试就魏蜀双方的农业经济开发及其与国家治乱、军事胜败的关系加以论述, 希望能由此认识西部农业的一些历史特点, 对当今的西部开发有所启示。

一、农业开发背景

东汉末年, 朝政腐败, 吏治废弛, 国困民贫, 各地农民起义不断,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 地方官僚和豪强地主各自培植武装, 纷纷独立割据, 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当时凉州军阀董卓控制关陇地区, 力量最为强大, 他率军攻入洛阳, 逼走袁绍, 废除少帝, 拥立献帝, 并恣意杀戮掠夺。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 董卓挟持汉献帝还都长安, 并驱使洛阳周围数百万人随行西迁, 将战火引入关陇地区。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 竞相扩

充实力, 纵兵虐民, 抢夺财物, 老百姓深受其害, 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 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片荒凉。后来董卓被王允所杀, 他的部众相互火并, 关中大乱, 人民锋镝余生, 四散而逃, 关中的难民有数十万东迁到今江苏徐州一带, 有十余万家流落荆州, 另有数万家逃亡益州。献帝西迁长安时, 关中一带还有数十万户民众, 经过这场大乱, “强者四散, 羸者相食, 二、三年间, 关中无复人迹。”^[1]西北主要农区遭到毁灭性破坏, 秦汉数百年来兴旺发达的关中经济由此萧条下来。

关渡之战后曹操统占中原; 赤壁之战中孙权刘备联合抗曹取胜。曹操战败后北还, 转而挥师西进潼关, 扫平关陇割据势力, 统一西北心腹地区。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 屯兵关中的马腾、韩遂等十部起兵反曹, 关中再次大乱, 引起人口大迁移, 关中刚恢复起来的人口又有数万户越过秦岭, 进入汉中盆地, 投奔张鲁。孙刘联兵抗曹取胜后, 刘备利用益州刘璋请他帮助抗击张鲁的机会, 于建安十六年率兵入蜀, 迅速占领益州, 后来又打败曹军, 占领汉中。延康元

收稿日期: 2002-02-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1BZS031)。

作者简介: 惠富平(1963—), 男, 陕西富平人, 南京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博士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农业史研究。

年(公元220年),曹操身死,其子曹丕废汉自立,改国号为魏;次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是为蜀汉;不久孙权也正式称帝,建立孙吴政权。魏蜀吴鼎足三分的局面形成。

在鼎足三国中,魏蜀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西北地区多在曹魏控制之下,巴蜀、汉中则为蜀汉占有。魏以关中西部 and 甘肃东南部为战略重地,蜀以永安(奉节)、城固、汉中、阳平关(勉县西)、阴平(文县)等为边防重镇。就社会经济条件来说,西北地区长期战乱,人口大量外逃,经济凋敝,农业生产几乎停顿。巴蜀一带,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产发达,号称天府之国,汉末战乱也未受多大影响。曹魏根据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在陕甘战略要地,大量开置屯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所产粮食供军安民。蜀汉在陕南地区的屯田很有限,主要依赖巴蜀农业区供给军粮。魏蜀在各自所占据的地域中,因地制宜,采取了不同的农业开发手段和措施,农业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国力和军力的强弱。

二、曹魏关陇屯田及河西开发

(一) 关陇屯田

屯田是由封建官府组织并强制劳动者进行垦种的耕作方式,曹魏屯田在我国屯垦史上素负盛名。汉末军阀混战,中原和西北农区人口大量流失死亡,耕地荒废,农业生产停顿,即所谓“土业无主,皆为公田”^[2]。那些割地称雄的军阀,处境也十分艰难,许多军队不攻自破。史载“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3]。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安排军民从事农耕,屯田积谷,才能挽救危亡,使军队免于瓦解流离。曹操曰:“夫定国之术,在于足食强兵,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4]前代屯田的经验和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促使曹魏大力推行屯田制,同时大量流民和无主荒地也为推行屯田创造了条件,屯田成为曹魏政权的主要土地制度和农业开发策略,关陇地区的屯田因此而兴,并取得显著成绩。

当时西北的一些战略要地都有屯田分布,关陇一带是屯田的重点地区。曹魏屯田可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军屯民屯都有一定的管理机构,以强制手段将兵士和民众组织起来,固定在土地上,开荒种粮。《三国志·郑浑传》记载,曹操出征张鲁时,京兆尹郑浑勤于稼穡,民安于农事;他派遣民众到汉中去

屯种,没有逃亡的人,与以往强制募民屯田,民众惊慌逃亡的情景形成明显对照,受到曹操赞赏^[5]。张鲁降曹后,雍州刺史张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6],让他们耕种汉末以来关中的大量荒地。汉末大乱时,大量关中民众逃亡至荆州等地,后来许多人陆续返回,曹魏给他们提供犁牛,安排其垦田耕种,曹魏时关中屯田地区的水利工程也有修整。汉成国渠原自今眉县引水,时因战乱失修而淤废,卫臻主持了修浚工程,并将原干渠向西扩展一百多里,自今宝鸡引千水,构成贯通关中西部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同州境内的引洛工程临晋陂,效益也比较显著。《晋书·食货志》说这两项工程“引千、洛溉舄鹵之地三千余顷,国以充实。”可见屯田还推动了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

除关中以外,陇右、河西以及西域也有屯田分布。《晋书·司马孚传》记载,魏明帝时与蜀汉连年交战,关中谷帛不足,乃“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邦(今甘肃天水西南),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三国志·苏则传》说,苏则任金城(今兰州)太守时,注意招抚因战乱而流散的各族民众,旬月之间,归附流民达数千家,他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河西和西域的屯田在有关文献和出土简牍中有零星反映。在河西地区,凉州刺史徐邈曾广开水田,招募农民租佃,很有成绩。在西域地区,楼兰、高昌、尼雅等地出土的大量木简及纸文书证明魏晋时期这里曾实行过屯田,而且屯田中已使用了牛耕技术,播种与灌溉也有严格的管理办法^[7]。

曹魏军屯方式是“且耕且战”,民屯的分配形式是按照比例分配生产物,即“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8]这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有利于安置流民,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推动关中和西北边地的农业生产开发,为其军事上的胜利奠定基础,但也必须指出,其屯田带有军事性和强制性,弊端很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曹魏屯田逐渐衰落。

(二) 河西农业开发

战国秦汉时期,河西曾是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汉武帝时驱除匈奴,设立河西四郡,从此河西便处在中原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以后中原向河西一带的移民、屯垦、置郡和设防从未间断,河西得到有效的开发,并成为中西贸易的通道。自东汉末年起,战祸频仍,河西羌胡迭争,导致当地经济残破,人

口锐减。曹魏政权建立后, 平定叛乱, 理顺民族关系, 开发河西, 进而经营西域, 目的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 以便全力对付吴蜀。当时出现了不少治理河西的能手, 徐邈、仓慈、皇甫隆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位。通过其事迹, 可以管窥当时河西农业开发的情况。

河西干旱少雨, 粮食缺乏, 魏明帝时, 徐邈任凉州刺史持节令护羌校尉, 大力修整武威、酒泉的盐池, 以盐换取羌人的粮食, 说明河西羌人当时已在从事农耕。他还在当地“广开水田, 募民佃之, 家家丰足, 仓库盈溢。”^[9]少雨的河西仰赖高山融雪, 也能开辟水田。生产的粮食除保证百姓口粮、供应当地驻军外, 还有盈余换取钱财, 以供通商费用。徐邈还同时在境内兴办学校, 禁断淫祀, 减轻刑法, 很受羌胡族信任。

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西汉时这里商业兴盛, 经济繁荣。汉末战乱使敦煌与内地隔绝, 有二十多年没有郡级官, “大姓雄张, 遂以为俗”。魏明帝时, 仓慈曾出任敦煌太守。他针对当时大姓雄张, 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 果断地采取扶持贫弱和抑制豪强大族的政策, 按人口占地多少分等交税, 清理大姓望族强加在百姓头上的重额税赋, 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 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开发。他不畏豪强, 秉公执法, 从宽处理属县的狱讼案件以解民困。他注意保护少数民族贸易, 胡人如愿去内地洛阳, 一律发给过往证明, 并派兵护送, 使西域胡商不再遭受豪族的阻挠与欺侮。仓慈在任期间革除积弊, 政绩显著, 很受胡汉人民拥戴和怀念。

仓慈以后的几任敦煌太守作为不大, 直至皇甫隆时, 敦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习俗才有了新的起色。皇甫隆为曹魏安定(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 他的主要功绩在农业方面。皇甫隆接任敦煌太守时, 注意到当地农业生产落后, 于是积极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经验。他教农民把高低不平的大片田地修整为低而平的小块地, 改掉过去的淹灌法, 采用过水漫灌的方法浇地。这样既节约用水, 又可以均匀地浇透整个地块。早在西汉时期, 中原地区已用耨车播种, 而敦煌到曹魏时还不知道这种播种方法, “不晓作耨犁, 用水及种, 人牛功力既费, 而收谷更少”。皇甫隆指导农民用耨车播种, 改撒播为条播。这样省力省时省籽种, 又便于中耕锄草。敦煌的农业技术经过这些变革, 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 年终算帐, “其年省庸力过半, 得谷加

五。”^[10]皇甫隆的农业技术革新措施, 给敦煌人民带来了好处。

可以看出, 曹魏时期河西农业开发对稳定西北、经营西域以及抗击蜀汉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成功经验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抑强扶弱, 减轻百姓负担; 二是发展丝路贸易, 处理好民族关系, 为农牧业生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是引入先进农业技术, 提高生产效率, 增加粮食生产。曹魏注意开发河西农业, 促进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秩序稳定, 以守为攻, 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

三、蜀汉治理西南及边防屯田

(一) 西南的治理

赤壁之战后, 刘备乘机进驻益州, 又与孙权中分荆州, 并北取汉中, 不久便建立蜀汉政权。汉代的益州相当于今西南地区, 自战国秦汉以来, 益州以蜀郡为主的成都平原地区, 农业生产相当发达,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称: “益州险塞, 沃野千里, 天府之土”。刘备另一谋士庞统也说“益州国富民强, 户口百万”^[11]。富庶的益州为蜀汉立国奠定了基础, 并为以后诸葛亮北征提供了大量粮草和兵员。但同时这里民族众多, 矛盾错综复杂, 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给蜀汉治理增加了许多困难, 使其有效统治区域长期局限于成都平原一带, 势必导致蜀汉的经济及军事力量不够强大。

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来看, 秦汉时期, 益州所在的西南地区民族杂居, 土地肥美, 物产丰饶, 民食稻鱼, 无凶年之忧, 只是许多地区的农业开发很有限。汉武帝平西南夷, 在这里设立郡县, 移民屯垦种粮, 益州的人口逐渐增加, 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蜀汉时期, 益州曾新置六郡, 加上过去已有的郡治, 益州已有郡22个, 但除了成都平原以外, 其它地区的经济还比较落后, 地处云贵的南中诸郡尤为突出。诸葛亮平定南中, “赋出叟濮, 耕牛、战马、犀草充继军储, 于是费用不乏。”^[12]叟、濮是民族称号, 当时南中地区民族众多, 农业生产落后, 但仍然要向蜀汉政权交纳赋税, 负担自然不轻, 民族反抗时有发生。地处四川南部的江阳郡, 四川北部的巴西郡, 重庆市所在的涪陵、巴东和巴郡等, 虽然存在若干“大姓”, 但多民族杂居, 可耕荒地多未开发, 社会矛盾错综复杂, 难于管辖。建兴三年(公元223年), 刘备身死, 诸葛亮为益州牧, 南中各郡叛乱, 声势浩大。但诸葛亮却“务

农植谷,闭关息民^[13],一年后方出兵。当时主要采取“南抚夷越”的方针,不留兵,不运粮,利用当地大姓豪强治理南中,以便稳定后方,出兵北伐。可见蜀汉政权对成都平原以外的广大民族地区缺乏有效的统辖和治理,这些地区提供的赋税不会太多,并且没有什么保证。

当时蜀汉的经济中心在成都平原。前256年蜀守李冰主持兴修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农业经济面貌大为改观,“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与关中平原并称为陆海。汉代的时候,山东、江南有灾,往往运送巴蜀的粮食救济。中原有乱,就有大批人口迁徙入蜀,从未听说过人满粮缺的情况。与关中平原相比,成都平原自然条件更为优越,又未遭汉末关中战争的厄运,农业生产主要采取租佃经营的方式,相对强制性的屯田经营来说,农民生产积极性较高,故农业生产水平长期不衰。刘备占据成都平原,为蜀汉立国奠定了基础。但这里四面大山阻隔,对外交通很不方便,适宜割据,却难以北进统一中原。而蜀汉的中心任务一直是北击曹魏,统一天下,其农业生产也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当刘备外出征战时,诸葛亮“常镇成都,足食足兵”,说明粮食和兵源主要仰赖蜀郡,其它地区只是时断时续地补充一些军资。法政的“劝农积谷”,诸葛亮的“闭境劝农,育养民物^[14]”,目的都是为了北伐曹魏。相传为诸葛亮所撰的《便宜十六策》中,曾提到“唯劝农业,无夺农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水经注》卷三三:“诸葛亮北征,以此堰(都江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大军北伐时,不忘派兵守护水利工程。劝农护堰一方面说明诸葛亮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出其重农的军事性目的。由于长期对外征战,消耗了大量财力与人力,导致民穷兵疲,益州农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本来就地小力微的蜀汉政权必然难以维持,这不能不说是蜀汉的悲剧。

(二) 边防屯田

蜀汉征服南中后,基本解除了北伐后顾之忧,又经过重农积谷,充实军备,获得了一定的人力和财力支持,于是诸葛亮六出祁山(甘肃礼县东)攻伐曹魏。蜀汉进驻攻战之地大致在今甘肃东南和陕西南部,即汉水与嘉陵江上游地带,那里距汉中和成都平原已比较遥远,而且沿途崇山峻岭,交通极为不便。成都平原农业发达,筹措粮草并不是很困难。据说刘禅投降后,蜀国“百姓布野,余粮栖亩”,国库尚有米四

十余万斛^[15]。关键是因秦岭等大山阻隔,大批粮草难以及时运送到军中。另外,粮草运输负担非常繁重。牛拉车载,人力肩挑背负,一人作战,往往需要几人甚至十几人转运粮食,人力财力耗费巨大。据说诸葛亮为便于长途运粮,减轻人力负担,曾发明木牛流马。且不说其是否属实,效果如何,它至少反映出当时长途运粮是蜀汉的沉重负担。诸葛亮曾亲自率领将帅去割魏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的麦子,可见其缺粮的窘况。司马懿说:“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16]魏国也很清楚诸葛亮前线军粮供应短缺。北伐运粮不济的教训,促使诸葛亮想办法就近解决军粮供给问题,于是开始注意在北方实施屯田。

早在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进驻汉中之时,已命赵子龙在赤崖屯田,以储备军粮,时间虽短暂,却为蜀国积累了一些屯田经验。建兴十年(公元232年),诸葛亮“劝农休士于黄沙^[17]”,有人认为黄沙在今陕西勉县东,可能是诸葛亮的屯田据点,只是屯垦人数和屯垦效果不详^[18]。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蜀汉十万大军自斜谷出兵武功,开始用流马运粮,进据五丈原,与司马懿相持。当时“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19]屯田地点大约在渭水南岸五丈原以北。蜀汉屯兵与当地居民融洽相处,屯田似乎比较顺利。不过屯兵数量依然不明,而且自二月出兵,八月诸葛亮身死退兵,时间不过半年多,屯田成果有限。后来,天水人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多次出兵北伐,凉州羌胡人还出资帮助,送给蜀军马牛羊和谷物^[20]。终因力量对比悬殊,姜维与魏交战大多失利或“粮尽而还”。后来姜维又率部在“沓中种麦^[21]”。沓中在今甘肃东南舟曲县西北,这里的屯田有一定成绩。未过多长时间,曹魏大军进攻蜀汉,后主刘禅投降。姜维在前线收到后主归降敕书,“将士咸怒,拔刀砍石”,但已无力回天。

屯田既是临时进行,时间又短暂,蜀汉北伐大军的粮草估计依赖于褒斜道,从汉中乃至蜀中运来。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运粮之役非常繁重。蜀汉长期对外用兵,不断运粮和筹粮,老百姓的赋役负担十分沉重,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必然会严重影响西南地区的农业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使蜀汉有限的国力越来越衰弱,最终归于灭亡。

参考文献:

- [1] (晋)陈 寿. 三国志·董卓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 (晋)陈 寿. 三国志·司马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卷六二[M]. 北京: 古籍出版社, 1956
- [4] (晋)陈 寿. 三国志·魏武帝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5] (唐)房玄龄. 晋书·司马孚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6] (晋)陈 寿. 三国志·张既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7] 赵予征. 丝绸之路屯垦研究[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 [8] (唐)房玄龄. 晋书·慕容皝载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9] (晋)陈 寿. 三国志·徐邈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0] (晋)陈 寿. 三国志·仓慈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1] (晋)陈 寿. 三国志·庞统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2] (晋)常 璩. 华阳国志·南中志[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4
- [13] (晋)陈 寿. 三国志·后主禅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4] (晋)陈 寿. 三国志·杜微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5] (晋)陈 寿. 三国志·后主禅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6] (唐)房玄龄. 晋书·宣帝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7] (晋)陈 寿. 三国志·后主禅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8] 张泽咸. 中国屯垦史: (中册)[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90 47.
- [19] (晋)陈 寿. 三国志·诸葛亮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0] (晋)陈 寿. 三国志: 卷四十五注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1] (晋)常 璩. 华阳国志·刘后主志[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4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n the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HU I Fu-ping

(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while the Cao Wei dominated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China, the Shu Han controlled the southwest region. The Cao Wei kingdom and the Shu Han kingdom fought one another mainly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The food supply for the army was the key factor to victory. Therefore both sides adopted some measures to resume and develop agriculture. To develop the Guan Long area and stabilize the Gansu Corridor, the Cao Wei kingdom went i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y military forces in a large scale in certain strategic places fit for agriculture to ensure sufficient food supply for army, and to effectively defend the Shu Han army. After the Shu Han held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Zhu Ge Liang (prime minister and military counsellor of Shu Han Kingdom) made great effort to deal well with the minorities there and made good use of the superiority of local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advised farmers on growing grain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food transportation for the northward expedition, the Shu Han set up relatively limited agricultural plot cultivated by military forces in some areas of the Hanzhong area and the south of Wei River. Because both sides adopted different policie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long-term impact could be seen on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struggle.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Wei, Shu Han and Wu; Western regio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